

文史哲

第六辑



310

文安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编 审:王均昌 冉德旺
主 编:冉德旺
副 主 编:徐志华
责任编辑:徐志华 吴焕章

文安文史资料

第六辑

政协文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省文安县印刷厂 印刷
1997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2000册 135千字

内部发行 注意保存

代序

王均昌

今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洗刷了沉浸在中华民族心中百年的耻辱；9月12日，中共十五大胜利召开，确立了指导中国走向富强的邓小平理论，构画出了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宏伟蓝图，这对全世界炎黄子孙来说，确是双喜临门。

正值全县各族人民欢庆香港顺利回归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之际，第六辑《文安文史资料》在文史工作者一年多辛勤努力下，又和广大的读者见面了。

本届政协以来，我县的文史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短短的五年时间，连续出版了四辑文史资料，计50余万字，其中被全国、省、市级文史采用逾20篇之多，这说明我县的文史工作已经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诸辑文史资料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成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通过发行和交流，《文安文史资料》已成为外界了解文安的一个窗口，提高了文安的知名度，也起到了各地文安籍人士，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与家乡人民情感联络的纽带作用。

几年来，我县的文史工作得到了全国各地文安籍老同志、

曾经在文安工作战斗过的老干部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社会各阶层人士及各有关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在此，我谨表示衷心感谢。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全民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祝愿这项工作，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在文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

1997年11月5日

目 录

代 序	王均昌(1)
平定柴恩波文安城驻军叛乱.....	蔡 远(1)
第二次进苇塘的一段经历	刘殿玉(25)
抗战时期两次夺粮斗争	杨连甲(29)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文安县党部	宋九苓(38)
关于天津“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回忆	万俊清(46)
凶寇恶水酿大灾	
—— 1939 年文安洼特大洪水溯源	狄绍青 井桂林(55)
1939 年大水前后的简忆	李益年(63)
吴希青年时期的革命经历	王兰芳(71)
三颗文安县印的故事	蔡 远(87)
儿童团琐记	王兰芳(93)
李静率师在朝鲜	盛星辉(99)
梨园世家 三代名人	
—— 京剧艺术家张世麟和他的父与子.....	甄光俊(109)

- 清代文安最高学府——广陵书院 吴焕章(122)
纪昊和他参加的博学鸿词科 孙锡川 王世昌(130)
- 马永珍习武二三事 王世昌(134)
- 文安境内文物概况 宁维新 周惠珍(137)
- 苦难的历程**
- 赵奎元抗战期间经历自述 徐志华(155)
我被抓去日本国挖煤的经过
..... 崔书进口述 王世昌整理(168)
于家屯惨案 于铁成口述 王世昌整理(172)
- 文安洼的鱼类及捕鱼技术 杨连甲(176)
文安洼人的捕猎生活 李益年(180)
- 文安西关王家烧鸡 井桂林(186)
风味独特的文安清真烧饼 井桂林(191)
- 后记 编者(195)

平定柴恩波文安城驻军叛乱

蔡 远

人生旅途马不停蹄，半个世纪弹指而去。

1938年12月，贺龙、关向应奉中央指示，率120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帮助三纵队和扩大自己的三项任务，于1939年1月25日，在河间惠伯口村与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师。北方分局决定，由贺龙、关向应、程子华、吕正操、黄敬等五同志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统一指挥冀中地区的部队和作战行动。

当时平津保地区的形势异常严峻和复杂多变。“七七事变”后至1938年冬，在日寇入侵，国民党军队溃败南撤，民族危难之际，富有革命传统的河北民众，为抗击日军的侵略，纷纷参军参战，在冀中区委领导下，部队大发展，根据地扩大，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形成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人们称之为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而同时，打着抗日旗号，乘机蜂涌而起的杂色武装也遍地皆是。他们招兵买马，自立番号，自封头衔，五花八门。老百姓形容那时是“遍地红旗飘，司令赛牛毛”的年月。在那些队伍里，多数是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纯朴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也有联庄会武装，以及国民党保安队、绿林帮伙、旧军警、散兵游勇等等，一齐踊跃加入各个山头的抗日杂牌军。

这些武装，是敌我双方都在争取的。在抗战初期，这一带的杂色武装，多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八路军，但一些投机分子则始终抱着个人野心，争夺地盘，各霸一方，尤其是原来的旧军警及绿林武装，在日军诱降及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策反之下，有的部队背弃抗日立场，叛变投敌。接受我改编又背叛人民的柴恩波部，就是这样一支部队。

以上略述柴恩波叛变的时代背景。笔者作为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之一，谨以此文侧重介绍平定柴叛之役发生在文安城及事件后的某些史料。

一、柴恩波发动叛乱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各地的反共磨擦事件日趋严重。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秘密指使中统特务方平，设法促使柴恩波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方平到文安后，即同新镇县长王宗琦（柴之舅）等国民党人频繁接触。

柴恩波何许人

柴恩波，1903年生于河北省新镇县（今文安）东羊町村。早期在军阀部队当过中尉排长，是个朝秦暮楚，政治上反复无常的人。“七七事变”前，柴系国民党新镇县保安队长，地头蛇；抗战刚开始，又一度充当新镇县日伪政权的保安队长。在我党的争取教育下，柴于1938年11月拘捕了日军顾问铃木三郎及伪县长李作宾，押送冀中军区，我抗日政府枪决了铃木，柴

率部反正，军区将他的保安队改编为冀中暂编第二团，委任柴为团长。柴即利用抗日旗号扩充武力，先后将张兰亭、任广宾、赵荫亭、赵壁臣、李保泉等杂色武装收编。1938年1月，柴部被改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二路，柴任总指挥；8月改编为八路军三纵队独立第二支队(相当旅)，柴任司令员。军区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支队任军政领导职务，但其原有的军事干部多为旧军警及土匪出身。该支队下属两个大队和特务营等直属部队，约四千兵力。改编不久，柴恩波为实现其扩大自己势力的野心，竟又暗中与王宗琦、方平等阴谋策划，于1939年2月18日叛变，散发反共传单，声明脱离冀中军区领导，并扣押了军区派到该支队的党员干部和文安县党政军主要领导共约百人。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即委任柴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

柴叛前文安城的形势

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春，文安城先后在国共两党手中。芦沟桥炮声一响，吓坏了国民党在文安城的末任县长韩新文，他先把家眷和七年搜刮百姓的金银财宝运往天津，然后令保安队护卫，带上财物车辆，乘黑夜从西门溜出文安城。不料，在逃往天津半路的白石碑漫洼野地，被护送他的保安队马队副图财害命，一枪打死。这一来，政权暂时落入封建士绅之手。当时文安县城由官钱局经理、县商会会长曹梦九、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芝圃及刘犀亭、王洁轩四大绅士控制着局面。1938年5月，冀中行署派来共产党员李凤林任文安县长，冯唤民任县府秘书兼教育科长，组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并成立了县政府基干自卫队。同年8月，李调任邱，冀中行署

派三分区专署专员仇友文兼任文安县长，李东山任县府民政科长。同时，三分区特派员刘沙来到文安发展党组织，同仇等筹建抗日团体。10月，中共文安县委成立，牛锐敏任书记。11月，成立了“文安县战时动员委员会”，仇友文兼主任。此时，县基干队改编为八路军三纵队九支队第23游击大队，大队长王常新，政委石良天。县大队已发展到一百多人枪，驻在城区。

自1938年冬，柴恩波部二大队张兰亭营与我们同驻在文安城。张营营部位于盐店以北的一个大院，下属四个连：一连长王汝其，二连长张思义，三连长肖树凯，四连长潘汝桥。张营常在县府东侧的操场上搞军训。笔者当年是一名小八路，在县府工作，我们常在操场边看张营操练。记得该营一连连长是个机灵鬼，中等个头，眼睛有神，约30来岁。据说他在旧军队带过兵。县府、县大队、战委会同张营在工作上常有联系，所以，没多久我们就同张营的不少官兵相互认识。

柴部文安城驻军叛变经过

寒冬腊月别去，人们正迎接春节来临之际，1939年2月18日（除夕），文安城风云突变。那天晚上，我们县政府、县大队、群众团体和张营官兵，一起在盐店以北的五岳观广场参加晚会，观看战委会组织的演出。约一小时后，张营一干部（据原张营三位老兵回忆，是一连连长王汝其）站在戏台一角宣布：“三营各连马上带出会场归营，有事情。”该营官兵即有秩序的带走了。那晚我们对张营带走没有引起警惕。约在晚10点左右，我们看完演出归来，路上寒风嗖嗖，回到单位刚烤了烤手，听到院里有动静，忽然门一响，常在操场见面的连长王汝其带一伙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腰里插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

装出一张笑脸，很客气的对李东山说道：“李科长，请你到营部去一趟。”没等李回过神来，他急忙又说：“李科长，把你的手枪交给我，先替你保管一下。”事发瞬间，猝不及防，李只好把手枪交出。那连长布置下数人看守李东山等人，便飞快地跑到前后院，用同样方式逮捕了仇友文、冯唤民、史树芳等干部。（据仇生前写的材料记载，被捕者还有刘沐、刘默辰等同志）张营执行叛乱计划，干得十分机密而又狡猾，临动手前一两个小时还让其全营官兵同我们一起开晚会。王汝其率该连冲进县府大院后，指挥战士迅速埋伏在各办公室、寝室门外，即先抓李东山。前后不过半小时就把县府二三十名干部战士“客客气气的”抓了起来。然后他高声叫着：“请大家排成两路，到营部集合。”我们就在叛军押解下离开县府大院。

解放前的文安城，街道较狭窄，城区也不甚大，三转两拐，我们就被押送到张营营部。途中，有些同志利用天黑路熟，在几个拐角及叉路口逃脱。县府多数同志是本城人，下班后大都回家住宿，因而当晚未被抓捕。次日都藏匿或转移出城。

我们到营部后，看到县大队约百名干部战士也被叛军缴械押到张营。大队长王常新，是位中等身材清瘦而健壮的人，目光炯炯有神，约 25 岁左右，言行常透着一股英武的军人气概。他也被捕了。是在抓捕仇县长的同时，张兰亭命所部二连连长张思义，带该连执行收缴县大队武器及扣押干部的命令。我县大队也是在看完演出后，刚回到营房就被张营包围缴械的。据尚健在的原张营二连战士何宪天老人回忆：他被迫参加收缴县大队武器时，随张连长进院之后，“各班奉命同时进屋，以快速的动作收了县大队的枪，未遇抵抗。”

我们在营部稍待片刻，以仇友文为首的军政领导及部分

干部即被先行押走。我随仇县长等被押到通往盐店的一条街路南的一个小院。这是拘禁仇等第一个关押处。次日又将我们转移到同一条街东头路北一座户主不在的空院。到此之后，我们发现张营士兵一律将胸章反过来佩戴，八路军的番号不见了，只见战士的姓名。这天上午，叛军又押来抓捕的三位领导干部。其中一人是我县大队政委石良天，是位对敌斗争坚决果敢，有军事素养的政工人员。他有着奔放的性格，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已近而立之年。同志们叫他“大石头”。柴部叛变当晚，他因公回大队部稍迟，未被抓捕，次日换上120师的棉军服出城，不料在城门被张营的人认出，强行扣押，“大石头”怒火升腾，奋力拒捕，被叛军打伤头部后拘留。另两位被捕者是军分区驻文安城的干部，一位北方人身材较高，年近不惑，是分区供给部一负责人；另一位系南方人，口音南腔北调，原是120师的干部，中等身材，约三十岁模样。待押送人员走后，仇县长即同几位领导同志悄声交谈，分析事件的性质，商议对策。

二、仇友文等被捕后的斗争

仇友文其人

仇友文，原名仇振远，1910年生于河北省蔚县东赵各庄一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从北平到霸县，以教书的合法身份为掩护，秘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革命思想，在霸县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培育了不少芬芳桃李。他曾因国民党人告密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

获释。“七七事变”后，仇友文到晋察冀边区阜平一带，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初调到冀中区，先后任深泽、安平县长，冀中三分区专署专员，同年8月兼任文安县长。在文安时，他给人的印象是英俊、刚强而机智。他当时不满30岁，中等身材，穿着朴素，眼睛明亮，言谈举止极有风度。而他最突出的特点，则是大公无私对党的事业富于奉献精神。由于以往的经历，他对文安、霸县一带的社会情况很熟悉，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可是，这次柴部突然叛变，使我方蒙受损失，是他未曾经历过的考验。面对现实，仇友文沉着冷静，在被关押期间，同叛军及国民党反共分子展开一场特殊的斗争。

刘沙化装会见仇友文

当年刚满20岁的刘沙，是中共文安县委组宣部长，后任副书记。她的公开身份是冀中区妇救会特派员、文安县“战委会”副主任。仇友文等被关押在第一处民房时，当晚，她找到我们，说要见仇县长。于是，她即到附近一住户中换上勤务员小刘的灰色棉军大衣，戴上棉军帽盖住短发，化装成小勤务员，由县府另一位小同志掩护她，借天黑，两人肩并肩，就在守大门的叛军哨兵眼皮底下混进院子。进了屋，当时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照明，光线暗淡，刘沙跳到炕上，仇友文等定睛一瞧，惊奇地发现是刘沙，几位同志压低声音问她：“你怎么来了？”刘沙顾不上细谈，忙小声告诉仇友文，已派人给地委送信去了。因院子里也有叛军的看守，仇忙摆手，不叫她往下谈。即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写了个字条交给她（据刘沙回忆录说，写的是：“翟：我们很好，放心”——翟，指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同志）。仇等担心刘沙的安全，催她快走。即仍由我们送她出了大门。

机智勇敢的刘沙与仇友文的会见，勾通了被扣押同志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这期间，多次掩护刘沙的有一位县妇救会干部李淑钗，约20来岁，乃文安县开明士绅李芝辅的二女儿，是位抗日积极分子，她作风洒脱，敢说敢干。柴叛之后，她帮刘沙在城内奔走，了解动态。把仇友文写的条子转送地委也是她办的。城里人都知道李淑钗有个小女婿。在正月十四那天，她让刘沙换上男装，象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扮作她的小丈夫，带上妇救会干部纪大娘的十二岁小女儿，装扮成哥、嫂、小姑娘一家人，提上醋瓶子，说是到东关去打醋，就混出了城。地委指示，刘沙和县委书记牛锐敏在我军攻城前撤出文安。牛、刘二同志即先后撤回地委。

稳定被捕同志情绪

刘沙与仇友文会见后的次日，我们即被押解到第二个关押处。这里距营部较近，独门独院，有从两边拾级而上的高台阶，院内有两间北屋、东西厢房和一个厕所，院子较大，围墙也高，张营即利用它作临时监狱。

仇友文的责任心很强，面临危局，他首先稳定大家情绪，消除少数人的恐惧心理，以团结内部，同叛军斗争。到此地之后，看管的较严了，每天有张营军官来检查。这时，在被关押干部中，有一位面孔略黑、说话慢吞吞的承审员。这位前不久还坐在公堂上审讯汉奸的抗日政府法官，骤然变成叛军的“阶下囚”，换了个位置，使他一下子失去精神支柱，感到大难临头了。在众人面前，这位外省人满面愁云，有些惊恐失态，在北屋的外间走来走去。他垂头丧气的自我表白：“我才倒霉啦，调到

文安县没多久，就赶上了柴恩波叛变。这下子完啦，唉！”仇县长听了不由得眉头一皱，他抓住时机，立即走到承审员面前，严肃地说：“你只是一个小职员，有什么怕的？一切事情由我仇友文一个人承担。”紧接着他义正词严地对在场的同志们说：“我们抗日无罪！大家都不要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一人负责。……”随后，仇又拍着承审员的肩膀，耐心地鼓励了他几句，这位外省人点头称是，神态好转。大家听了仇的一番话，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仇友文教唱《囚徒之歌》

仇友文有多年工作的实际锻炼，他讲话声音宏亮，唱歌也优美动听。以往在县府开大会时，散会前大家常欢迎他唱支歌。可如今是在敌营中相聚。此时，仇友文虽心情沉重，但为了坚定大家意志，在被关押的第三天，吃罢大锅饭后，他就站在北屋的走廊上，招呼大家：“请同志们都出来，我教大家唱歌，几个小鬼也过来跟着学”。——县长在狱中教歌，是新鲜事，大家顿时活跃起来，一扫沉闷的气氛。我们就都站到院子里。仇笑迷迷地接着说：“教大家唱高尔基的《囚徒之歌》，好不好？”众人齐声高喊：“好！”仇即先唱了一遍，然后他教一句，大家跟着学唱一句，约半小时基本学会，于是仇挥动起拳头打拍子，大家齐唱。那天，恰好张营军官还没来检查，深沉、凝重而雄壮的歌声，唤起被关押同志的大无畏精神，这歌声飘出院外，撼人心灵，连大门口的张营哨兵也听得入了神，不忍心禁止我们唱歌。时隔半个世纪，笔者尚依稀记得两段歌词，大意是：

太阳出来又落山呐，

监狱永远是黑暗。
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
站在我们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
我们逃不出牢监。
纵然若是逃了出去，
打碎千斤锁链。

逆境却能催人奋进，艰险可以凝聚人心。十几位下属人员，如今同仇县长在一个院，同起同住，成了患难之友。跟着他学唱《囚徒之歌》之后，既感到这位“父母官”平易近人，又使大家情绪起了明显变化——抗战立场更加坚定。

把看守所办成俱乐部

人在落难中常感到时光过得慢。大家情绪稳定之后，仇友文即组织被扣压人员因陋就简地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亲自布置：先让县大队张树绅去借象棋（小张和我是同村人，当年十六岁，已入党，今尚健在）。小张刚出大门，仇友文又派我到“战委会”的女同志李乃如家去借书。李是学生出身的国民党员，家住城内，她拥护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1938年即参加了抗日活动，且同李东山科长很要好，二李两心相悦。这次李东山同仇友文一起被扣押，她心急如焚，终日奔走，设法营救。这一半出于爱国心，一半出于对李东山的爱恋。这次我去借书，她详细询问了被扣押同志的处境，从她眼神里流露出对李东山安危的牵挂和忧虑。她很快找出一套《红楼梦》交给我。我回来后，小张已先把象棋借回来了。于是，一部分下棋，观棋，